

# 評介黃寬重《孫應時的學宦生涯： 道學追隨者對南宋中期 政局變動的因應》

王亭方\*

書名：《孫應時的學宦生涯：道學追隨者對南宋中期政局變動的因應》

作者：黃寬重

出版社：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

出版日期：2018

頁數：362 頁

元人於《宋史·文苑傳》指出，宋代「下之為人臣者，自宰相以至令錄，無不擢科」，<sup>1</sup>得見宋代政治中士人群體的重要地位。前人研究針對宋代士人已有豐碩成果，惟受限於史料與課題，學者多聚焦於高官大儒，關注主要的政治事件、人物以及相關制度。上層精英士人因此獲得密切關注，中低階層士人的活動遂少受青睞。對此，近年學界多有反思。<sup>2</sup>黃寬重教授新作《孫應

---

\*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

<sup>1</sup> 元·脫脫，《宋史》（點校本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），卷439，〈文苑傳〉，頁12997。

<sup>2</sup> 關於學界對於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反省，參見方震華，〈傳統領域如何發展？——對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幾點觀察〉，《臺大歷史學報》，48（臺北，2011.12），頁

時的學宦生涯：道學追隨者對南宋中期政局變動的因應》一書，即以孫應時（1154-1206）的生平為經，其人際網絡為緯，交織出南宋中低階層士人的生命圖像，藉此重新檢視宋史研究的相關議題。

黃氏早期關注南宋和戰、義軍、家族等課題，近年將研究重心轉向南宋士人的人際網絡，探討人際往來對士人生命的影響。本書出版前，作者已發表數篇與孫應時相關的研究，足見對此課題用力之深。<sup>3</sup>甫出版，虞雲國、許浩然即先後為文評介，顯見學界對本書之重視。<sup>4</sup>

---

165-184。

- <sup>3</sup> 黃氏所發表與孫應時相關之研究，有以下六篇：〈學宦皆空：孫應時坎坷困窘的生命側寫〉，第四屆「國際漢學會議」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，2012年6月20-22日，會後收入柳立言主編，《近世中國之變與不變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，2013），頁1-52；〈師承與轉益：以孫應時的陸門學友為中心探討〉，第九屆「史學與文獻學學術研討會」，臺北：東吳大學歷史學系，2013年5月3-4日，會後以〈師承與轉益：以孫應時《燭湖集》中的陸門學友為中心〉為題，刊登於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，85：1（臺北，2014.3），頁1-64；〈宋史研究與版本問題——以孫應時的《燭湖集》為例〉，第四屆「中國古文獻與傳統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」，香港：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，2013年12月13-15日，會後以〈宋史研究與版本問題——以孫應時的《燭湖集》為例〉為題，刊登於《文獻》，2015：5（北京，2015.9），頁3-13；〈論學與議政——從書信看孫應時與其師長的時代關懷〉，「十至十三世紀中國精英的交流：以書信與筆記作為研究材料 Letters and Notebooks as Sources for Elite Communication in China, 900-1300」國際學術工作坊，Oxford: Pembroke College, University of Oxford, 2014年1月8-10日，會後以〈論學與議政——從書信看孫應時與其師長的時代關懷〉為題，刊登於《北大史學》，20（北京，2016.12），頁224-251、頁426-427；〈宋代士人的鄉里情懷：以孫應時的鄉里師友與鄉里關懷為例〉，「九至十五世紀的中國 Conference on Middle Period China, 800-1400」國際學術研討會，Cambridge, Mass.: Harvard University, 2014年6月5-8日，會後以〈南宋士人的鄉里師友與地方關懷——以孫應時為例〉為題，刊登於《新史學》，25：3（臺北，2014.9），頁65-102；〈孫應時與史彌遠〉，「十至十三世紀中國國家與社會」國際學術研討會，杭州：中國宋史研究會、杭州師範大學，2014年8月19-21日，會後以〈孫應時與史彌遠〉為題，刊登於《長庚人文社會學報》，8：1（臺北，2015.4），頁1-31。此外，黃氏於2012年以「學宦生涯——孫應時的生命世界與人生際遇」一題申請科技部計畫。
- <sup>4</sup> 許浩然，〈黃寬重《孫應時的學宦生涯》〉，《唐宋歷史評論》，5（北京，2018.12），頁232-242；虞雲國，〈黃寬重《孫應時的學宦生涯——道學追隨者對南宋中期政局變動的因應》〉，《漢學研究》，37：1（臺北，2019.3），頁339-345。

全書共有八章，除導言與結論外，可分為兩部分：二、三、四、七章以孫應時為軸心，五、六章則針對孫應時師友進行觀察。書末有兩篇附錄，分別為孫應時傳世文集《燭湖集》的版本介紹以及孫氏書文的編年整理。

第一章〈導言〉中，黃氏揭示全書主旨，並概述研究背景及相關史料。本書以孫應時為討論重心，回應學界「關注中低階層士人生命世界的呼籲」。<sup>5</sup>對宋代士人而言，科舉、薦舉與政治環境變動，皆影響仕途與生涯。相較於高官大儒，為數眾多的中低階層士人缺乏改變制度與環境的能力。理解他們如何應對這些外在挑戰，將有助於瞭解宋代士人階層及政治文化。作為南宋中期一名中低階層士人官員，孫應時最高職位僅為常熟知縣。他既是道學追隨者，也經歷過慶元黨禁，並因與道學領袖相交而受牽連。由上可見，孫應時的學宦經驗，是當時多數中低階層官員與道學追隨者會面對的處境。

第二章〈奠基鄉里：孫氏家族及其餘姚人際網絡〉，藉由分析孫家由農轉儒的過程，探討人際交往對於個人及家族的影響。孫家人丁單薄，務農為生，世代業儒者寡。在鄉里義學結交胡、莫二家，這段因師生關係建立的情誼，是孫家得以轉型的關鍵。孫家能在三代轉變身份，即受惠於胡、莫兩家的幫助。目前關於宋代人際關係的討論多數強調「婚姻」的影響力，但從孫家一案來看，得以扭轉其地位的關鍵是「教育」。由於一般家族無法獨立支持子弟受教育，鄉里聚集優秀子弟共同受教，原先不屬於士人群體的家族便能藉此進入士人圈。鄉里教育不僅提供舉業的敲門磚，更是人際網絡的起點。

第三章〈學宦難兼：為學仕進的左支右絀與人際的拓展〉，討論孫應時從入仕到慶元黨禁前的仕宦際遇與人際交往。科舉入仕後，仕途發展受薦舉影響，薦舉又賴長官欣賞，建立官場上的人脈遂為仕進者的重要任務。孫應時缺乏顯赫家世，鄉里情誼亦不

---

<sup>5</sup> 黃寬重，《孫應時的學宦生涯：道學追隨者對南宋中期政局變動的因應》（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，2018），頁3。

足以支持其仕宦之需。因此，他於學、仕場域中不斷開拓人脈資源，以求裨益宦途。此時，孫氏的人際建立除了透過太學、為官任內認識之外，待闕期間任教於史浩（1106-1194）所建之東湖書院，也讓孫應時得以廣結人脈。然而，對於無家族、聲望可依傍的孫應時而言，一般官員改官所需的五份舉薦信仍屬難事。當四川制置使丘燾（1135-1208）邀請孫應時擔任幕僚時，考量到幕僚改官之法相對簡便，孫應時遂轉任幕僚，終因協助治蜀有功而成功晉升。

第四章〈黨禁池魚：政局動盪下的因應與人際網絡重構〉，討論慶元黨禁期間，孫應時所受衝擊及其應對。慶元黨禁是南宋中期道學學者與執政官僚之間的對決。身兼道學追隨者及中低階層官員的孫應時，雖未捲入政爭中心，卻因師友皆遭罷黜，奧援盡失。此時，孫應時獲任富縣常熟縣知縣，雖是具發展性職位，卻因政治局勢不明反而身陷困境。孫氏在文教方面的政績不為上層重視，上層強調的賦稅縣政又難以達成。在多重壓力下，孫應時一方面與政爭中心人物保持距離，另一方面也積極尋找突破口，接觸當時執政中心人物，藉此紓解困境。縱使身為道學追隨者，孫應時仍必須妥協於政治壓力，向理念不同者尋求協助。

道學與黨爭是南宋士人共同的課題。第五章〈師承轉益：陸學門人的師從變化與道學流派的競合〉與第六章〈應變世變：慶元黨禁前後孫應時學友的遭遇與應對〉，即觀察孫應時往來之師友面對道學與黨爭時的處境與應對。過去道學研究以大儒為中心，視其師承一貫且明確，論說上不免將現象簡單化。作者指出，事實上宋代一般士人往往師承多元，未如後世學案所示而有嚴謹師承。以孫應時及其學友為例，身為後世認定的陸學門人，他們多有「兼學多師」乃至於「轉益他師」的現象。其次，孫應時及其學友皆因在太學接觸陸九淵（1139-1193），而得投拜入門，這提醒吾人太學對於學術傳播的影響。太學作為南宋社會當中知識與人際網絡的重要樞紐，在道學發展中擔任怎樣的角色，值得進一步關注。

以往黨禁研究或集中討論重要人物，或觀察特定群體，其政治與學術立場清楚明確。然而，孫應時及其學友面對黨禁時，分別出現堅持、轉向及退隱等不同抉擇，反應出士人選擇的多樣性。作者指出，道學群體中，不同層級的士人受自身擁有的資源、人脈影響，面對政治衝擊的承受能力各有不同。具有家族、聲望的碩儒宰執通常能全身而退；相對而言，中低階層士人官僚缺乏後盾，在應對上必須更為謹慎。建立多元的人脈成為一般士人維繫政治生涯的策略，因此「個人固難有永久堅持的原則，群體間也未必存在始終一致的對立」。<sup>6</sup>

第七章〈青史播芳：孫應時的平反與《燭湖集》〉，主要將孫應時與史彌遠（1164-1233）的關係置於時代背景當中觀察，探討史彌遠對於孫應時死後平反一事的影響。孫應時任教東湖時結識史浩之子史彌遠，離開東湖之後，孫、史持續有書文往返。從孫應時與史家往來的書信詩文，可見孫、史二人關係親厚。黨禁後期，時任宰執的韓侂胄（1152-1207）為籌備對金戰事，黨禁逐漸鬆綁。北伐失利，韓侂胄因主持戰事而被殺，史彌遠漸掌大權。雖然此時孫應時早已病故，但從平反時間、地方志的編寫等跡象來看，孫氏以一基層官僚身分，得以與其他大儒同時獲得平反，應與史氏掌政有關。

第八章〈結語〉則針對孫應時生平、書信使用，以及南宋政治與人際網絡三點做總結。首先，孫應時的生平經歷是南宋同時期多數士人的生命群像。最初透過教育、科考而得以躍升宦途，入仕後基於薦舉所需而留心人際經營；仕宦中又因政局糾葛而為宦途帶來波折。其次，缺乏顯赫事功的孫應時能做為研究對象，實有賴其書信留存。書信與士人生命史結合，還原出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與情感，也反映宋代士人複雜且重要的人際活動。最後，個人仕宦發展受人際網絡影響，而人際網絡又被政治環境牽動。一般士人因缺乏政治背景與學術影響力，面對政治變化時，其選

---

<sup>6</sup> 黃寬重，《孫應時的學宦生涯：道學追隨者對南宋中期政局變動的因應》，頁238。

擇往往受人際關係與現實環境牽制，「集團」與「意識」並非左右選擇的唯一動機。總結而論，孫應時及其學友的際遇，使研究者得以動態觀察一般士人個人與群體間的互動，擴展對現有南宋士人與政治的討論。

本書雖為傳記形式，但作者以人際互動為核心，將孫應時與時代背景緊密串連。章節安排上，第二、三、四章討論孫應時生平的同時，也強調鄉里的人際建立、學宦時期的人際拓展，以及政治動盪下的人際重構。第五、六兩章則向外探討孫應時師友的際遇，使讀者能藉由相互對照，感受孫應時與同時代士人的共通與特殊之處。整體安排，使讀者在認識孫應時之際，得以深刻感受到人際網絡對於宋代士人生涯的意義，顯見作者的用心。

史料運用是本書一大特色。本書大量使用《燭湖集》以及相關人等的書信，重構孫應時的交遊與關懷。書信並非新史料，惟研究者往往關注書信格式、網絡或書信內容涉及的議題，較少處理書信與人際互動的關係。<sup>7</sup>實際上，書信為人與人之間往覆交流的載體，具有私人性質，更能反映撰文者的思想與情感。進而撰文者與收信人的親疏，亦會呈現於書信內容之中。因此，書信非常適合作為人際網絡的研究材料。如孫應時寫給朱熹（1130-1200）、史浩以及平輩友人的信件所呈現內容之異同，即體現孫氏對於師、友等人際關係的處理。現今數位人文蓬勃發展，研究者固然可藉由數位工具快速掌握人際網絡的狀況。但欲細緻探討人際互動中時間的變化、親疏遠近的差距乃至於真實情感的呈現，量化數據仍然難以取代以書信為主的文字史料。

不過，書信當中所涉及之時間、人名、稱謂等多不易確認，又因寄、收雙方身處同一時代，對於當時制度、典故等常語焉不

---

<sup>7</sup> 關於宋代書信史料的使用，平田茂樹曾專文進行考察，指出現有成果中書信史料的使用著重在書信的格式、使用網絡以及以書信為材料探討思想發展與形成。余英時亦指出，過往引用朱、陸二人往來辯駁書信，僅注意意見相左之處，卻未見書信前後問候、關懷之語。參見平田茂樹，〈宋代書信的政治功用——以魏了翁《鶴山先生大全文集》為線索〉，《北大史學》，20（北京，2016.12），頁255；余英時，《朱熹的歷史世界》（臺北：允晨文化實業公司，2003），下冊，頁78-80。

詳。研究者若不能詳盡整理文集，並明確掌握時代背景，將難以洞悉信件背後的未盡之意。作者於本書附錄中，針對《燭湖集》進行審慎的整理。除了確認書信編年之外，亦考訂現存文淵閣本及靜遠軒藏本，展現出深厚的文獻考據功力。進而黃氏因嫻熟南宋相關典章制度、政治事件，故能針對史料進行非常精彩的分析。例如黃氏將幕僚的薦舉方式，與孫應時長期的發展進行結合，解讀出孫氏選擇成為丘密幕僚，是為日後舉薦問題考量。此事孫應時並未直接訴諸文字，如非精熟宋代政治制度以及孫氏文集，實是難以解讀。<sup>8</sup>

此外，本書雖為個案研究，但作者在字裡行間展現出與既有研究對話的用心。首先，關於地方家族的討論，既有研究成果強調婚姻的重要性，認為家族多藉由婚姻建立人際網絡，弱化科舉對於宋代社會流動的影響。<sup>9</sup>然而從孫應時家族發跡的過程可以看到，孫家透過鄉里教育與地方家族建立關係、改換門庭之後，才得以締結婚姻。姻親關係固然是一種穩固家族發展的手段，但對於缺乏家世支撐的孫家而言，以追求舉業為目標的鄉里教育才是建立人際網絡、獲得資源的重要起點。當家族發展已具規模後，確實可憑藉婚姻、政治等社會資源維繫家族地位；但不能因此忽略科舉、鄉里教育對於地方家族發展的影響。

其次，宋代道學研究多以大儒為中心，強調思想流變、道學群體發展等。黃氏跳脫道學領袖的視角，由道學追隨者切入，探討一般士人與道學的關係。作者指出，如孫應時等追隨道學的一般士人多遊走於大儒之間，或許師從一人，但不代表學術立場從此壁壘分明，更遑論將其政治活動視作學術的延伸。道學追隨者

<sup>8</sup> 黃寬重，《孫應時的學宦生涯：道學追隨者對南宋中期政局變動的因應》，頁71-72。

<sup>9</sup> 美國學者柯睿格（Edward A. Kracke）提出關於宋代社會流動的討論之後，郝若貝（Robert M. Hartwell）和韓明士（Robert Hymes）透過分析宋朝官員的家世背景，指出科舉並未對宋代社會帶來大量的流動。韓明士認為，宋代家族可依靠婚姻、學術等社會資源維持其優勢。此說出現之後，為了重新探討宋代社會流動與科舉之間的關係，宋代家族研究如雨後春筍般興起，一時蔚為顯學。關於過往學界對於宋代宗族婚姻的討論，可參見郭恩秀，〈八〇年代以來宋代宗族史中文論著研究回顧〉，《新史學》，16：1（臺北，2005.3），頁136-142。

追求學術的同時，現實的政治情勢、人際關係以及個人發展等因素皆會左右其動向。例如黨禁期間，擁有家世、聲望的士人較有能力堅持其立場；但身為缺乏背景的士人，孫應時相較之下選擇接受更多的妥協。因此，著名學者、重要理論確實為道學帶來重大影響，但眾多道學追隨者所面臨的現實因素亦應納入觀察，方能更為全面的理解道學發展與南宋社會之間的關係。

最後，作者透過孫應時的仕宦經歷，指出人際網絡對於宋代政治的重要性，更進一步帶出人際網絡之於宋史研究的意義。宋代因取士眾多，以致於官多闕少，經營人際網絡遂為獲得舉薦機會的關鍵。而政治動盪之際，人際網絡也將左右士人的際遇。本書傳主孫應時，先是因自身人脈無法支持晉升，故而轉任幕僚以求舉薦機會；而當師友因黨爭無力照應時，即便孫氏自身未被捲入政爭中心，其仕途仍因此難以為繼。可見制度與政局雖足以牽制人的活動，但身處其中的人們亦會嘗試以各種方式回應挑戰。既有研究成果對於宋代政治事件、官僚制度等方面已討論甚多，而作者對於孫應時人際往來與其仕宦生涯的討論，無疑為研究者指引出新的研究取徑。綜上所述，本書藉由個案與學界既有成果進行對話，成功演示如何執行宋代中低階層士人官員相關研究，並透過對於孫應時的觀察，提醒研究者歷史現場的複雜性。

近幾年，宋史學界有鑑於宋代制度史、政治史等研究侷限，嘗試開展新的政治史議題。<sup>10</sup>如鄧小南提倡「活的制度史」，平田茂樹的「政治過程論」、「政治空間論」、「政治溝通論」，<sup>11</sup>以及魏

---

<sup>10</sup> 關於學界對於宋代政治史、制度史的反省，參見鄧小南，〈走向「活」的制度史——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為例的點滴思考〉，收入包偉民主編，《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（1900-2000）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4），頁10-19；黃寬重，〈從活的制度邁向新的政治史——綜論宋代政治史研究趨向〉，《中國史研究》，2009：4（北京，2009），頁69-80；方震華，〈傳統領域如何發展？——對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幾點觀察〉，頁165-184；魏希德（Hilde De Weerdt）著，傅揚譯，〈重塑中國政治史〉，《漢學研究通訊》，34：2（臺北，2015.5），頁1-9。

<sup>11</sup> 參見平田茂樹著，呂明劍譯〈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新的可能性——以政治空間和交流為線索〉，文收平田茂樹、遠藤隆俊、岡元司主編，《宋代社會的空間與交流》（開封：河南大學出版社，2008），頁13-27。

希德（Hilde De Weerd）以「政治交流」為核心討論南宋科舉制度及南宋士人精英對國家的歸屬感。<sup>12</sup>本書以中低階層士人的角度切入南宋政治史，跳脫精英士人的框架，無疑再次為宋代政治史研究注入一股活水，為後進學人開拓宋史研究的視野。

（責任編輯：王亭方 校對：黃品欣）

---

<sup>12</sup> 參見 Hilde de Weerd, *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Negotiating Standards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Imperial China (1127–1279)*(Cambridge, Mass.: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, 2007) 是書於 2016 年出版中譯本，魏希德，《義旨之爭：南宋科舉規範之折衝》（杭州：浙江大學出版社，2016）；Hilde de Weerd, *Information, Territory, and Networks: The Crisis and Maintenance of Empire in Song China* (Cambridge, Ma and London: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, 2016.)

